

星期文库

“上古史话”系列之七

止干戈服三苗

李向伟

禹代理国政时,河湖被疏浚,道路已修筑,四方基本安定,只有“三苗”部落,不太服从政令。

三苗是位于南方长江中游的部落,非常桀骜不驯,经常与中原地区离心离德。关于三苗部落的起源,有人说,当年蚩尤率领九黎部落,与黄帝部落在涿鹿大战失败,少部分南迁,与有苗部落结合,形成三苗部落。还有一种说法是,尧禅位于舜,三苗首领不服,发动叛乱,遭到镇压,余部逃亡至长江中游地区。东晋学者郭璞在《山海经注》说:“昔尧以天下让舜,三苗之君非之,帝杀之。有苗之民叛入南海,为三苗国。”

不争的事实是,尧舜禹三代,三苗部落一直是中原部族统一天下的障碍。禹治水成功后,曾向舜报告:“辅成五服,至于五千里,州十二师,外薄四海,咸建五长,各道有功,苗顽不即功,帝其念哉。”在四方各地都完成了任务,只有三苗人顽固,暂时还没有平定。帝舜说:“道吾德,乃女功序之也。”意思是,用我的道德来引导,凭你的能力一定会让他们归顺。

禹代政不久,舜说:“咨,禹!惟时有苗弗率,汝徂征。”现在三苗人还不从,你带人去征讨他们。

出征前,禹召集将士誓师:“那些愚顽的三苗人,不讲道义、不走正道,不服从王命,正直的人被排挤,不肖之徒窃据高位,对受苦的百姓不管不顾,上天会降灾给他们。现在,我们奉上天命去惩罚他们。大家务必齐心协力,建立功勋。”

战斗进行了三十天,三苗民众仗仗要地势顽固抵抗,拒不投降。禹的老部下、老成持重的益,提出大胆动议:“以德服人,才能感动天地。舜早年遭受父母虐待,却始终诚心诚意地自责,将所有罪过都自己承担,从未怨恨过苍天和父母。他去见父亲的时候,总是态度端正,战战兢兢。在这种情况下,即便是顽固的瞽叟,也能被感化。常言道,至诚能够感动神明,更何况那些有苗族人呢?”

善于纳谏的禹听到这番话,大加赞赏,不顾天子身份,对益行下拜礼,说:“您讲得很对,就应该这样!”下令立即停战,班师回朝。

帝舜本身就有“道吾德,乃女功序之也”的理念,非常同意益和禹的做法。

他们从此大力施行文德教化,经常鼓励臣民在朝堂前的平地上,举办盛大的舞会,人们举着战争中使用的盾牌和雉尾,载歌载舞,表示偃武修文的决心。

不出预料,七十天后,三苗族人自动前来归顺,天下从此大治。

舜禹以德化人、止戈息争的和平理念,影响了中国社会几千年,大大促进了中华民族的融合,也大大促进了大一统的华夏民族国家形成。

稿。初稿一毕立即抄写,边抄边改,定稿时约十万字。1956年底此书出版,引起了良好的社会反响。此后朱正一直行走在业余研究鲁迅的路上,出版了《鲁迅的人际关系》《鲁迅的人脉》《鲁迅回忆录正误》《鲁迅三兄弟》《鲁迅的一世纪》《鲁迅图传》等许多著作,九十多岁还在不断打磨相关著作,他也因此成为国内鲁迅研究界最具影响力的学术权威之一。我们不难设想,假若朱正舍不得事先下那么大功夫做

善刀而藏

游宇明

案头准备,他是否还能开创如此一番事业?

不懂得善刀而藏必然付出惨重的代价。宋孝宗赵昚是个很有名望的皇帝,在位期间注重内政、整顿吏治、裁汰冗官、重视理财、饥荒年间花力气赈济百姓,使南宋一度呈现安定局面,史称“乾淳之治”,史家誉其为“南渡诸帝之称首”。然而就是这样一位明君,刚即位时也曾马失前蹄。绍兴三十二年(1162)六月,宋高宗赵构禅位于身为养子的他。宋孝宗即

位时,正值金兵背叛盟约,边境不断发生战事之际。宋孝宗忧心如焚,决定立即排解这个困局。叶绍翁《四朝闻见录》载:当时南宋的情况是“内乏谋臣,外无良将,士卒既少而练习不精”。翰林学士、知制诰史浩建议朝廷忍耐一段时间,“内修政治,外固疆圉,上收人才,下裕民力,乃选良将,练精卒,备器械,积资粮”,等条件成熟再进攻。宋孝宗没有听进去,他绕过三省、枢密院,直接命令大将出征,结果军队在符离大败,“卒十有三万,一夕而溃,死者不可胜数;资粮甲兵,捐弃殆尽。天子哀痛,下诏罪己”。可是巨大的损失已经造成,宋孝宗再“罪己”又能起什么作用呢?

善刀而藏需要破除内心的浮躁和急功近利。心中有了目标,先不要好大喜功、急躁冒进,而要选择做“笨人”,在准备上不断付出自己的血汗,等着客观情势推动着你行动时再放手一搏。机会,是要等到真正的“机”(时机)才应该去“会”(利用)。准备工作没做足,“机”还没真正到来或已经过了,你执意要去“会”,等待你的肯定是一地鸡毛。

许多时候,所谓人生的智慧,并不仅仅指的一个人穿越风沙弥漫的无人区的孤勇,其实也包含了善刀而藏、一步步走近期待已久的美好图景的耐心。

小。”这时孩子的姑姑也冒出来搭话:“我也是39码,她俩要是都穿不了,我穿。”一家人你一言我一语,热热闹闹地就把换鞋码的事定了下来。

从44码到39码,不过是几个数字

从44码到39码

尚庆朝

的转换,却牵出了一串温暖的回应。

翻看群里的消息时,我忽然想起前几天的事:大女儿刚给我买了一双新鞋,一进门就催我试穿。我摆手说:“都是44码,不用试。”她却认真地说:

“那也得试试,不合适我去换。”看着我满意地走了几步,她才笑了。这一刻,我猛然惊醒:从我的44码,到女儿们的39码,我才第一次清晰地知道她们的鞋码。我这个做父亲的,是不是在日常的忙碌中疏忽了太多这样的细微小事?

几天后,快递到了。小女儿放学回家后迫不及待地拆开奖品,大笑起来:“这是足力健老人鞋!奶奶,你快试试合脚不?”母亲惊讶地走过去,小心翼翼地穿上——不大不小,正合适。小女儿拍下照片发在群里,家人纷纷说这鞋就像给老人定做的一样。

哦,原来母亲的鞋也是39码。

午。当时贾老师的住处还在西北大学。在此之前,我对贾老师的散文已经佩服得五体投地。特别是他的“商州初录”“商州再录”系列。约会是孙老师事先给贾平凹打过电话,我们约好见面时间的。记忆中是西大大门北侧里边的一栋楼,五或六层吧。敲响门铃后,我报上了姓名,贾老师“哦”了一声,说:“是见喜让你来的?”就热情

向贾平凹约稿

陈嘉瑞

地让我进来坐下,然后说:“我给咱泡茶。”当时屋里还有两位陌生人,彼此都不认识,大家就都坐着,等着茶水泡好。知道贾老师抽烟,我拿出事先准备好的一条烟,贾老师斜眼看到笑了,说:“你拿烟做啥,我这儿烟多得很。”茶泡好了,他给大家倒上,是粗粗的那种茶碗,手推着说让大家喝。环顾他的室内满满当当,桌上桌下全堆着物品。有各种石刻、佛像、笔砚,满室都

是古旧的气息。我适时拿出我们的样刊,说明了来意。贾老师抽着烟,眯着眼前后翻着看,嘴里念着刊名,问:“你们是家具装修的?”我回复说是。说是里面的“灯影砚潮”栏目,想约他写稿。贾老师放下杂志,说他考虑一下,写了就给我。当时杂志因为有专业性的特点,文学栏目的要求比较特别,有一些稿子约来了,由于不符合杂志定位,难以发表。贾老师说考虑一下,也正符合我的愿望。我是觉得应该给贾老师一些时间,不能催得过早。于是,大家就又继续喝茶,两位陌生人接着和贾老师聊上了,听起来好像有什么重要的策划。我觉得不便继续打扰,就提出了先行离开。贾老师说“好好好”,起身送我出门。临别他送我一名片,老红底色的那种,上面除了侧底印上空心的“平凹”和一个电话外,什么也没有。

后来,贾老师陷入了越来越忙的写作和事务中,我的约稿没有了任何消息。我也不好为一篇千字文,厚着脸皮再盯着贾老师。就这样,我唯一的一次向贾平凹约稿未能如愿。

熟悉的一位画家朋友外出采风特别喜欢乘高铁,他家离高铁站并不远,只有十五六公里路程,但他每次都会提前一个小时零二十分钟打网约车,到达候车室一般还有半小时左右的时间。家里人劝他不必这么性急,大可在家里多待一会儿再走。朋友回答:“我安排了三十来分钟冗余时间,用来对付中途堵车或其他紧急情况,虽然几乎没用过,但有了这样的安排,我每次出行心态都很从容。”

我是赞成朋友的做法的,他的选择让我想起一个古老的成语:善刀而藏。此成语来自《庄子·养生主》,原文是“善刀而藏之”,本义指收刀之前先要将其擦拭干净,后来引申为做一件事须作充分准备。

善刀而藏无疑是一种明智的做事思路,坐火车应该如此,经营更大的事业同样应该如此。著名编辑家、学者朱正年轻时被分配到《新湖南报》(后来的《湖南日报》)做记者,主要采写一些关于农村抗旱、秋收方面的文章。他工作游刃有余,且常有余暇,便开始大量收集鲁迅的文章,超过一半的工资都用于购买相关资料,实在买不起的,就一字一句地抄。经过数年的资料准备和认真思考,1956年大年三十晚上,他启动了《鲁迅传略》的写作,只花了不到两个月的时间便完成了初

微信提示音突然响起,是某杂志社的编辑老师发来的消息,告知我的文章在征文活动中获得了三等奖,奖品是一双鞋,并让我提供鞋码。我回复了44码,却得知没有这个尺码,于是我试探着询问能否换成女款,得到同意后,我立刻去问了家人的鞋码。

我在家人群里@了爱人和孩子并说明了缘由,随后问道:“小女儿穿多大的鞋?”大女儿秒回:“38码,但之前带她买鞋时她说有点挤,应该39码更合适。”我解释说奖品没有男款了,想换成女款39码。大女儿笑着接话:“行,她要是穿不了我穿。”爱人跟着说道:“不同牌子的鞋码有偏差,宁大勿

上世纪90年代,西安有一本全国知名的杂志,叫《家具与生活》,我是这家杂志的编辑部主任。杂志有一档文学栏目,叫“灯影砚潮”,请文化名人来谈居室文化。当时在这个栏目发稿的人不少,梅绍静、车前子、李佩芝、陈长吟、孙见喜、何丹萌、方英文、孔明、穆涛,等等。这些稿子,大都是我们自己约来的。

1994年暑天的一个下午,天气很热,我赴西安西门外约孙见喜的稿子。约好了,也就想好了下一步,想通过他进而再约到贾平凹的稿子。记着我提了一个西瓜见孙老师的。孙老师很热情,坐下以后打开冰箱,把冻好的冰块磕到一个盘子里,再给我加到有果汁的水杯里。谈话进行得很愉快。天热,盘子里的冰块一会儿就化了。孙老师又将化开的水,倒入方格中放入冰箱再冻。听说我想通过他引荐,进而向贾平凹约稿,孙老师答应得很干脆,说可以。后来,孙老师的稿子刊登了,标题是《书架架忆》,我是责任编辑。

约贾平凹的稿,也是在一个下